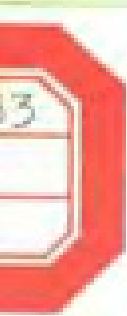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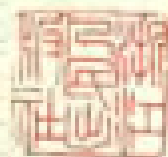


浙江文化丛书 ○

浙江方志源流

魏 桥 王志邦 俞佐平 王永太



2011.11.17.85
421

浙江文化丛书

浙江方志源流

魏 桥 王志邦

俞佐平 王永太

浙江人民出版社



55001

责任编辑 何梦祥

封面设计 王义钢

浙江方志源流

魏 桥 王志邦 俞佐萍 王永太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排版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7万 印数3,101—4,100
1988年8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7-213-00176-0/G·32 定 价：3.00 元

出版者的话

历史上的浙江，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大概从宋以降直至近代，就被誉为文物之邦。探索浙江的文化渊源、文化发展规律，研究浙江在中华文明史上做出的建树，及在内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等等，既是对中华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方面和深入；又是总结历史经验，可为发展文化提供借鉴；还可能起到增进振兴中华自信心的作用。这是我们出版“浙江文化丛书”的初衷。令人感奋的是这一想法很快获得省内外学术界的赞同。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杭大校长沈善洪，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历史学教授毛昭晰欣然允当顾问，省社科院编审、副院长魏桥力担主编的重任，王士伦、吴光、朱宏达、陆坚、郑云山、胡国枢、龚延明等学者应聘为编委。他们斟酌选题、组稿、审稿，花费了很大精力，才使本丛书得以陆续问世。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但如何编好这套丛书，尚需各界的关注。尤望国内外学者不吝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文化丛书》序

· 夏 衍

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从古以来，两浙不仅山川秀丽，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不说远古，南北朝的沈约、谢灵运，到近代的龚自珍、王国维，现代的鲁迅、茅盾、郁达夫都是浙江人。当然也还有许许多多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前者从王充、陈亮、黄宗羲、朱舜水到蔡元培，后者可以从沈括、毕升，一直数到当今的钱学森、钱三强，他们也都是浙江人。以上仅略举数人，浙江作为“文物之邦”，可见一斑。我作为浙江人，对此是常引以为自豪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大转折时期，新旧交替时期。在文化建设上比较突出的有一个创新和传统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化传统，既是珍贵的遗产，又是沉重的包袱，也就是文化传统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分析，区别对待。有人认为要创新就必须与传统一刀两断、彻底决裂，我看这个问题应该慎重讨论。五四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好象这个口号也是浙江人钱

玄同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很果断，也很彻底，但是缺乏具体分析，所以结果不仅没有打倒，反而因为树敌太多，引起了一股尊孔逆流。中国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人口如此之多，象孔子那样的学说能够在这样一个国家延续两三千年之久，假如它全是糟粕，没有一点精华，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够以勤劳、勇敢、智慧自傲，看来儒学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所以我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不能一刀切，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时期，要鼓励人们大胆地探索，勇敢地创新，对西方文化各种思潮、各种流派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封建的、闭关自守的、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传统，同时也要继承、吸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传统。

《浙江文化丛书》是本着这个精神编写出版的，因此我是很赞同的。

浙江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仅仅出过很多人才；陶瓷、丝织的发明在浙江；作为成熟的中国戏曲艺术也诞生于浙南的永嘉；古越的书院、出版和藏书都非常发达；至于学派，如浙东学派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昔日浙江的文化如此昌盛，当非偶然现象，有它的发展规律，即自身的因素，也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为此，那是应该予以必要的探索，加以总结的。这对今天发展和繁荣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以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素有“文物之邦”誉称的浙江，一定能发扬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培养出比以前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振兴中华，建设经济富庶、文化昌盛的新浙江，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986年深秋

浙江地方志简述

地方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瑰宝，也是世界文献中独特的著作。编纂地方志如果从它的渊源《禹贡》、《山海经》等著作算起，迄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可说是源远流长，而且是代代相传的。据统计，我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现存的达八千五百多种，近十一万卷，占了我国整个古籍的十分之一，为正史《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余卷的三十倍，这是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重大财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作用和影响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方志的产生、持续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的产生、发展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需要，没有其他各种文化事业相应的发展，地方志就不可能历久不衰，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地方志从诞生之日起，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治乱，能够代代相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诸种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因素。地方志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有助于地方长官“察国情”，“别疆域”，“记风土”，“稽物产”，“量治绩”，“裨教化”，“存故事”，可以直接为当时政治服务。关于方志的功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对此作了科学的概括：“新方志应当系统

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新方志可借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新方志可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当前不少地方的修志实践证明，通过编修地方志，可以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深化改革，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修志在自身的发展中提高了信誉，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名，这是与它优越的客观条件分不开的。浙江气温适中，四季分明，光照较多，热量丰富，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浙江大地上人类活动就相当广泛。全省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百处以上。距今六千年至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五千年至六千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四千年至五千年的良渚文化表明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就为修志事业提供一定的基础。

由于地方志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地方志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应该说这是地方志的共同的特点，浙江当然也不例外。从作为发端时期的志书汉代的《越绝书》，到六朝世族地主纂修的不拘一格的各类方志，到宋代的基本定型的方志《临安三志》等，到明代出现的第一部记述一省范围的嘉靖《浙江通志》，到方志鼎盛时期的清朝，浙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

各类方志，再到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龙游县志》、《鄞县志》等，都是因时而作，在不断发展中前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成的《浙江分县简志》、《建德县志》、《萧山县志》等，采用了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体例，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受到人们的瞩目。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作为“方志之乡”的浙江还有下列三个方面的优势，值得引起重视。

第一，方志编纂时间早，数量多，质量也较好。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说明浙江修志历史悠久。仅明清两代纂修的浙江地方志现存的就有三百三十种，八千零十二卷。清乾隆年间编选的《四库全书》中，采录的浙江方志无论从种数和卷数统计，均为全国各省之冠。南宋的《临安三志》是“世所罕传”的佳作。嵊县的《剡录》后人评为“序述有法，简洁古雅，迥在诸志之上”。嘉泰《会稽志》和宝庆《会稽续志》被誉为方志的“双绝”，其他还有不少佳作名篇。据梁启超所推荐的方志佳作一百二十种，浙江的就占了二十种，为总数的六分之一，可见一斑。

第二，不少著名学者参加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浙江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之邦，人才密集之区，为修志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浙江历代著名学者如贺循、孔灵符、陆游、周密、谈钥、高似孙、陈耆卿、袁桷、章燾、徐一夔、方孝孺、田汝成、章懋、夏时正、张元忬、谈迁、黄宗羲、万斯同、毛奇龄、傅王露、梁诗正、全祖望、齐召南、章学诚、邵晋涵、严可均、俞樾、钱泰吉、李慈铭、王棻、戚学标、沈曾植、孙诒让、王国维、鲁迅、余绍宋、陈训正等都参加过地方史志的编纂工作。会稽的章学诚不仅编修了大量志书，还提出了一整套修志理论，创立了修志体例，建立了“方志学”，堪称

方志大师。文化的熏陶，修志的实践培养了人才，有了人才又促使修志事业后继有人，不断前进。

第三，自宋代以来，浙江的版刻和藏书事业相当发达，出了不少著名的私人出版家和藏书家。宁波的天一阁，瑞安的海楼，杭州的八千卷楼和南浔的嘉业堂，都收藏了大量典籍和地方志，为修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宁波的天一阁就是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单位之一。天一阁开创者范钦原是明嘉靖十一年进士，他到过许多省份，收集了四百三十多种地方志，精心保存起来，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以上只是对浙江地方志的发展从整体上作一简要的概括，下面还要分别不同时期作比较细致的阐述。

目 录

浙江地方志简述

- | | | |
|-----|-----------------------------------|-----|
| 第一章 | 两汉浙江方志的起源 | 1 |
| 第二章 | 六朝之际的浙江方志 | 18 |
| 第三章 | 隋唐时期浙江方志的发展 | 37 |
| 第四章 | 宋代，浙江修志史上的重大转折 | 54 |
| 第五章 | 元代，浙江方志在稳定中发展 | 93 |
| 第六章 | 明代，浙江修志进入了兴盛时代..... | 106 |
| 第七章 | 清代，浙江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 | 144 |
| 第八章 | 民国，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的过渡阶
段..... | 198 |
| 第九章 |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编修社会主义时
期第一代新方志..... | 223 |
| 后 记 | | 234 |

第一章 两汉浙江方志的起源

1 时尚促成浙江方志的发端

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现存最古的浙江地方文献，自明代以来，不少学者视此二书为中国方志的渊源。我们认为，这两部书可以看作中国方志的发端；但把方志的渊源归结到这两部书上，不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方志作为文化现象，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兴起自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就以这两部书的实例来说，它们的产生就有一个历史的孕育过程。

吴越的历史是这两部书记载的重点内容。但它不产生于秦统一中国之后，也不产生于西汉王朝统治期间，而是产生在东汉，这里就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和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文化积累以资终结、借鉴的问题。

在秦朝的时候，秦王朝虽然采取了允许吴越历史在民间流传，并尊重吴越旧地的文化传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华夏文化与吴越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为吴越故地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因素；但是，撰写方志的文化条件远不具备，即各种学科的知识本身尚属较低级阶段，也未在士人中普及。同时，撰写方志的社会条件也不具备，如于越之民在文化上还不足以撰写这样的著作，而新迁入的中原之民虽然相对来说比于越人知

识面要广，但他们多系黔首，既对吴越历史不了解，又系新迁，生活尚需重作安排，恐怕也是既无文化上的基础，也无经济实力。更何况秦王朝在短短的十数年中，大兴土木，重征戍卒，民不堪扰。兹后就很快在农民大起义中灭亡。所以，在秦王朝的浙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著作，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会出现类似性质的地方性文献。

西汉王朝，文景之前，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属于战后恢复时期，武帝时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武帝独尊儒术，也即主张士人治经，因而文人学士也多以治经为正业，兼写一些汉赋。治史，只作为政府中专业机构人员之事，地理书之类还依存在史中。郡国计书中的地理部分，又多半记述简略，仅供州牧治政和向中央呈报计书之需，这是就全国而言。以浙江来说，当时地广人稀，生产技术，文化状况均落后于中原。为此，武帝曾令黄河下游的贫民来会稽开垦，这时期虽也有一些强族是因徙强宗被迫来浙，但毕竟人数不多，还不能起到倡导文风的作用。总之，整个西汉时期的物质文化条件已有很大发展。而西汉时期史学的巨大成就，地理书的出现，辞赋文章在文人中的普及，已为日后方志的诞生提供了文化上的借鉴，而西汉时期生产的发展所造成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自雄地方，蕴育了渐深的地方的乡土观念，政府实行士人由州牧推举任官制度，又使得州县应当了解管区的风土人物，凡此种种，都与方志系时代需要的命题挂起钩来。

到了东汉，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西汉时期经济文化的延续发展，至东汉初期已使雏形方志有脱胎而出的可能。

其次，由于光武帝及其后代各帝，信谶纬之学，实际上并不提倡正统的儒术，当然会影响士人的学风。光武帝是靠农民起

义的风暴起家，以讖纬作舆论，收揽人物，制造声势的。登上帝位之后，还需靠讖纬巩固帝位，为此，他要充分肯定讖纬。但这样一来，既然讖纬可讲，非经传所载的异闻自然可记，便为杂收民间吴越历史传说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开了先例。再则，光武帝出于褒扬自己家乡风俗人物的愿望，明诏南阳，“撰作风俗”。接着各郡也相依效法，于是“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郡国之书，即郡书，编纂目的不外乎刘知幾所指出的“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这样，就出现了郡书编纂的热潮。

东汉时，地理书的撰写也受到士人的关注，据《隋书·经籍志》云：

“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之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这段文章概括了西汉初至东汉初地理书发展的脉络。西汉后期的地理书，如朱赣的《地理书》所记内容“浹于九州”，牵涉到地理、户口、风俗。对东汉及后世影响是很大的，东汉人辛氏便著有《三秦记》，应劭也著有《地理风俗记》。有学者指出，朱赣的《地理书》乃是“后世方志中地理、风俗志之发端所在。”这个评价毫不夸张，而是恰如其分。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方志应运而生了。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现存方志中最古的志书。它们在东汉初的问世，自然不能脱离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这一根本性的前提，然而也应当结合当时吴越旧地的情况来加以研究。

东汉初年的会稽，因地处远离中原的东南，并未遭受西汉末年大战乱的破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继续发展，使它成为一块世人瞩目的乐土。中原的战乱使很多北方士人南来会稽，直到光武建元，天下初定，这些士人仍旧未还中土，当时“会稽颇称多士”。这些士人定居之后，至少会起到倡导文风的作用。会稽本地的文化水准比之以往也大为提高，如出现了象王充这样的伟大思想家，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时官立的和私立的学校也已发展起来。再以经济而言，举越布为例，质量之高可与丝织罗绮相仿，连光武帝都见而好之，兹后常令会稽郡贡献越布。

这些都可以说明，产生《越绝书》、《吴越春秋》的文化条件、经济条件已经具备。

在全国各郡士人编纂郡书的风潮影响下，会稽的士人自然也要卷入洪流。但会稽仍不同于中原各郡。中原各郡历代英灵奇士济济；而会稽从秦至东汉初的二百年间，能载光郡国的人物却并不多，不足载光邦国。然而先秦的会稽却出现过国灭而复兴，威霸中原的越国勾践君臣，从他们的功业来说，也仅次于故沛、南阳的两汉开国君臣，何况于越的历史既可见之于史书的记载，又由于昔日秦王朝的优容政策并未禁止民间流传，作为士著的作者可随时从民间采访，以补史之不足。这大概正是这两部志书取材的缘由。

浙江属于发端阶段的志书，除《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外，据现存书目看，尚有《临海水土记》、《四明山记》、《会稽贡举簿》等。《临海水土记》，系东汉杨孚所撰，大抵记临海山川、物产之类，为浙江最早的风土记。《四明山记》，为汉寿春人梅福著，是今可见浙江志目中最早的山志。《会稽贡举簿》，不知撰者名氏，其记有关会稽郡长官推举的本郡人员以

及长官之属官的名氏、行状等。

从以上情况看，汉代浙江志书的种类，有述山川、物产的风土记，专记山的山记，有述人物的《吴越春秋》，有述人物而兼职官志、选举表性质的《会稽贡举簿》，更有将山川、古迹、物产、人物、建置、传说等融于一书并以记述先秦于越、吴两国之事为重心的《越绝书》。概而观之，浙江方志起源于两汉是确凿无疑的。尽管汉代的地方文献和后世同类属性的志书很难说得上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系统，它们对后世各类志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则是无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方志的发端，其源头就不止一个，而是由几条涓涓溪流多源并进，并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为其发源地。而作为发端阶段的方志，其中《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向来为方志学家所推崇，并被视作方志的鼻祖。然而，学术界却有争议，一些学者将它们看作杂史、别史，或称地方史。因此，在论述浙江方志的起源时，就不能不花一定的篇幅来讨论它们。

2 《越绝书》与浙江方志的缘起

《越绝书》，袁康、吴平编纂，在《七录》、《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著录中都云十六卷。而《崇文总目》、《宋史》等则著录十五卷。据《崇文总目》载，该书原本内纪八，外传十七，凡二十五篇。今存十五卷凡十九篇。其中，外传十三篇，即外传本事第一、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外传记策考第七、外传记范伯第八、外传记地传第十、外传记倪第十一、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外传记宝剑第十三、外传记军气第十五、外传枕中第十六、外传春申君第十七、德序外传记第十八、篇叙外传记第十九；内传四篇，即荆平王内传第二、吴内传第四、请余内

传第六、内传陈成恒第九；内经两篇，即计倪内经第五，内经九术第十四。在这十九篇中，除首篇《外传本事》为全书序文，陈述书名、作者及“经”、“传”、“内”、“外”之别，阐明编纂宗旨；末篇《篇叙外传记》为跋语，以概括前面诸篇，再次申述编纂之旨及用隐语记作者具体姓名外，所余十七篇的内容大体是：一、记地理（包括建置、都邑、冢墓等）；二、记人物。人物之中，有吴之太伯、阖庐、夫差、伍子胥、伯嚭、王孙骆、公孙圣等，于越之勾践、范蠡、文种、计倪、西施、郑旦等。此外，尚有楚平王、伍奢、春申君、黄歇、李园……等。

从《越绝书》记述的内容看，已露志书之端倪，为六朝地记的编纂树立了典范。为志书人物传的编纂提供了经验。首先，《外传记吴地传》、《外传记地传》两篇，记述吴、于越两国都邑建筑、山川湖泊，以及交通情况，事涉秦汉，基本按类而述，自成体例。如先述都邑，次为交通，再次为山湖，具备了一定的格局。述城池，必言其周围大小，象记伍子胥城云：“周九里，二百七十步”。述山川湖泊，必记其方位，与县城距离；其中湖泊还注意记载面积的大小，如云：“太湖，周三万六千顷。其千顷，乌程也。去县五十里。”同时，在城池、山川、湖泊的具体记述中，将有关人物事迹、传说轶闻有机地融合于一体。记人物，寓褒贬于记事之中，不作评价。此种传统志书的编纂原则在这两篇地传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如《外传记吴地传》有这么一段记载：

“寿春东鳧陵亢者，古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与越王无疆并。威王后烈王，子幽王，后怀王也。怀王子顷襄王也，秦始皇灭之。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